

# 以学生为中心，高校要有预见性与判断力

■郭英剑

5月24日,我在《中国科学报》发表《以学生为中心,不等于以学生满意度为中心》一文,针对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所刊文章中,认为“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观已演变为“以学生的满意度为中心”,并提出要纠正偏差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出了偏差,而是做得还不到位。文章刊发后,引发了一些热议。也有人追问,我国高校中现行各项政策规定都已很齐全、规范,好多大学都拥有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辐射面很广,但为何还被认为是并未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

## 高度的预见性与准确的判断力

众所周知,要想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仅有理念、口号,以及规章制度是不够的,如何将理念和制度落在每个遇到困难的学生身上至关重要。我以为,在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和制度落到实处时,高校更应具有高度的预见性与准确的判断力。所谓预见性,是指要对高校中所有以学生为主或与学生有关的人、事、物及其发展有明确的预判和前瞻。所谓判断力,是指针对现实状况、学生的实际需求作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后的言行,代表着高校教育人的态度和塑造学生性格的价值观念。高等教育的管理政策与措施不能只有具体条文,在注重对其文字理解与具体阐释的同时,更应重视在具体操作层面出现问题后怎样应对。诚然这要求管理层有有效的补救措施,但更应在出台相关规定与措施时,就要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凡是与学生有关的规定与措施,高校在制定时都应想到具体操作上面可能遇到的问题。以下,我将从事教学、管理等细节问题入手,看看我们怎样加强预见性与判断力,方能更加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 怎样关切学生的专业疑问

我一直认为,当今中国高校的最大问题是管理问题。而管理问题虽与管理者有很大关系,但绝不是管理人员的问题,而是一门与全体教职员工都有关系的大学问题。比如,管理者该如何预判学生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疑问?这里的问题与疑问都是与学生休戚相关的,如专业选择、课程内容、奖励学金等。由于我国高校的奖励学金是另外一个系统,这里不赘述,只针对专业方面的相关问题,来探讨需要完善之处。如今,新生入校时都会有较为详尽的学生手册,多是厚厚的一大本。但即便学生已经通读全本,还会有很多困惑与问题。高校管理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让学生读一读规章制度,他们的一切问题与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学生很可能根本不去看那些八股式



中国高校目前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能在管理上找到源头——宏观而言,管理涉及大学使命,具体体现在管理理念、价值观、政策及其手段和措施上,但最终都要看如何落在实处、效果如何。说到底,一切关乎细节。

的条文,他们主要靠教师讲解、靠同学口耳相传来获得相应的信息。如此一来,当他们有疑问与问题时,自然会去寻找教职员工的询问。若单纯依靠管理人员解答这些疑问,既浪费师生时间,也浪费彼此精力。但遗憾的是,这却是当下很多高校处理此类问题的主要方式。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最简便的方法是通过学院网站。信息不全、考虑不周、不把网页作为信息与资源的中转站是当下很多网站的通病,不过这并非我要谈的重点。浏览当下很多高校特别是学院的网页,会产生一大疑问,即不知道它是展示给谁看的。换言之,虽然各高校以及二级学院都很重视网站建设,但它们共有的问题是——网页貌似是给所有人看的,却往往忽视了其中最重要的浏览对象——学生,包括未来的学生、在校生以及毕业的校友。对于学院网站来说,在校生应被视为最主要的浏览对象。如果照此标准,很多学院的网站并不合格,因为它未能体现学生关切的内容,也并不具备学生找到一切有用信息资源的通道功能。有人可能会说,很多高校都有强大的校园网,其中信息资源丰富,但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替代应由学院网站所承担的作用。比如,学院相关专业的详细信息、专业的师资队伍状况、课程的丰富内容,特别是针对本专业学生遇到的问题所应提供的答案。在这方面,国外顶尖大学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经验。以哈佛大学英文系的网站为例,可以看到如下特点。首先,以在校生为中心。头条均为学生最关心的内容——专业的师资队伍状况、如何进入或转入该专业、重点课程特色。其次,专业信息齐全。针对本科生、研究生设置不同菜单,与其密切相关的信息内容应有尽有,包括专业指南、如何申请和转入英语专业、如何申请第二专业、如何寻求导师帮助;研究生内容则包括如何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各专业课描述、如何写作论文、论文写作资源等。当然还少不了课程菜单,里面

有学期或学年所有课程的信息。课程本身有网站的,还会将课程网站链接放在上面。可以说,通过该网站,学生可以了解几乎所有关切的内容。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再花时间去寻找教职员工的询问,由此也减轻了教职员工不必要的负担。当然,这不是哈佛英文系才有的,而是很多美国高校的普遍做法。此外,我对高校的学院网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除了应该丰富各种专业信息外,对于各种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学生可能有的共性问题,可采用国外最常见的“问题与解答”(Q&A)的方式,将所有预判到的问题,以一问一答的形式直观罗列出来,或许更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 如何对待“听不懂”问题

“以学生为中心”不代表要“以学生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在学生的学业问题上,高校应具有更准确的判断力,措施应对得当。我们知道,无论是本科教学还是硕士生教学,往往都会遇到学生反映课程阅读量过大、教师所授课程听不懂的现象。现实中,但凡遇到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教师妥协,降低课程难度、减少阅读量。这种做法看似以学生需求为中心,满足了学生当下的愿望,学生或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很有可能是不当的。其错误之处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未做调查。遇到这类状况,应该首先对有多少学生反映课程问题做真实、有效的调查,如果是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的问题,那么帮助其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跟上现有课程进度,才是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单纯降低课程难度,减少阅读量,实际上是给教育质量掺水。其次是未做反省。如果有1/3乃至1/2的学生反映课程有问题,教师最应该做的是反省教学大纲与日常教学是否超纲,学院应反思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否符合其国家标准与教学指南。如果超纲或不符合

# 中国大学评论



姜秀娟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大学生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技能)下滑问题已得到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而且,这一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普通高校内。学生基本知识不扎实,成了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所需要的创新人才不说,就连普通工作也难以胜任。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眼下大学生学科竞赛中的无序、混乱已经成为扰乱大学生安心学习基础知识的一个重要诱因,需要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

理论上讲,大学生学科竞赛反映教与学成效,对学校教学具有强化作用。现实也是如此,国内目标端正、组织良好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为参赛学生提供了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同时,竞赛也能激发学生的挑战欲、探究兴趣和拼搏精神。总之,优质学科竞赛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种拓展,它让学生看到知识的价值和魅力,促使学生更加热爱学习和敬畏知识。然而遗憾的是,当下过多、过滥的大学生学科竞赛鱼目混珠,导致学科竞赛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时有发生。

竞赛“乱象”一方面表现为主办方开展相关活动偏离以赛拔优、树立标杆的目的,纯粹以奖项来吸引学生参加。当下的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的总奖项比例一般在50%以上。有的竞赛项目名称“高大上”,而赛事组织却相当随意,对参赛选手没有资格限定,对参赛作品没有规格要求,对参赛选手作品也无诚信监督。

同时,奖项产生也相当随意。面对数量庞大的参赛作品,评奖专家能面上看一下已相当不错,一些高等级奖项是否实至名归,非常值得怀疑。有的全国性竞赛项目存在不规范分包、转包情况,有的竞赛项目仅从其大而无边的名称中就可推知其有多“水”。笔者曾惊讶于很多文科考研学生的履历中有“×国数学建模竞赛奖项,经多方打听方得知,学生只要交报名费都能网上参加,大多数人也能得到高低不等的奖项。而所谓的×国,绝大多数参赛者是国内学生,竞赛的实际主办者也主要是华人。

竞赛“乱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参加比赛偏离以赛挖潜、促进学习的目的,纯粹靠外力获得奖项。不少学生为了考研、求职目的,希望得到竞赛奖项,但他们却觉得没必要提升自己的学术本领,因为他们认为,大学生学科竞赛奖项与参赛者的真实学术没有太大关系。必须承认,现在在本科生拿着相关课题组导师或研究生学长的作品参赛,或通过赠团队挂名得到奖项。这种做法当然应被禁止,但成果负责人往往出于为课题组增光、多一个听话的学生、情面等因素考虑,自愿让出成果所有权或署名权。这种情况学校也是心知肚明的,但往往会站在“学校荣誉”的角度不加干涉。旁观同学可能会有意见,但大多敢怒而不敢言。这就导致大学生竞赛奖项署名虚假情况时有发生。

更糟糕的是,有的赛事组织相当混乱,规则及审核形同虚设,让竞赛奖项成了“无厘头”。比如,某校每年都有不同的学生拿着同一个作品去参赛,竟然年年得奖;有的学生甚至付费委托中介公司为其包办奖项。总之,学生通过投机钻营来获得大学生竞赛奖项的做法,加深了学生“知识学习不重要”的错误认知。大学生学科竞赛“乱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竞赛“乱象”中,主办方和参赛者皆看重竞赛奖项的功利性,忽视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公平公正性。竞赛“乱象”看似发生在少部分人身上,但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自然会波及大多数学生——很多大学低年级学生不专心学习基础知识,而是去关心和参加各种竞赛活动。这不能怪学生,因为在考研、求职等方面,扎实的基础知识远不如多个竞赛奖项来得“显眼”。

此外,还要强化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作用。科技管理和领导部门要维护建议的独立性,在营造包容“发声”和善于倾听不同声音的学术科研环境的同时,丰富战略科学家建言献策渠道。总之,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厚植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沃土,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适应国家战略需求、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战略科学家发现、培养、使用机制。

建立一支战略科学家队伍的一个前提,是

要摸清我国战略科技人才需求的结构,以及急需、紧缺顶尖科技人才的数量与分布,制定人才发展需求和政策清单,有针对性地支持、引进、培育一批科技创新人才,强化重点领域科技人才支撑。

在青年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既要敢于让青年人才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产

业创新突破中担当大任,也要引导高校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优化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布局,强化科教协同和产教融合育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科学精神的培育,通过科学探索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引导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和探究能力。

针对目前的“破五唯”改革,要避免战略科学家称号捆绑利益被过度使用,探索“立新标”,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积极引导服务对象、用户、第三方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等共同参与人才评价。同时,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过度干预,让科研回归价值本位。彻底根治将学术资源配置、职称评审等简单与人才称号、学术头衔、行政权力直接挂钩的行为,探索建立更加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坚决制止在项目评审、评奖评优中拉关系、打招呼等不良现象。

此外,还要强化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作用。科技管理和领导部门要维护建议的独立性,在营造包容“发声”和善于倾听不同声音的学术科研环境的同时,丰富战略科学家建言献策渠道。

总之,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厚植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沃土,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适应国家战略需求、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战略科学家发现、培养、使用机制。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竞赛「乱象」是大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的重要诱因

# 战略科学家成长需厚植“沃土”

■林成华

作为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战略科学家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也是近年来我国人才培养和使用

的重点。然而,当前我国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还远远不够。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使用还存在一些亟待优化的突出问题。

## 结构、体系尚待健全

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但人力资源密度却偏低。据科技部《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全国研发(R&D)人员总量达到712.9万人,但在R&D人员全时当量中的占比仅为43.9%,而世界主要国家都在50%以上,韩国R&D研究人员占比更是高达81.5%。这表明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R&D人员投入强度仍然偏低。在部分重点领域的顶尖人才储备方面,科睿唯安2021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内地共935人次入选,占比14.2%,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数据虽然远高于2018年的7.9%,但与榜首美国2622人次入选、占比39.7%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内地上榜科学家所属学科主要为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等,在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神经科学等领域人数较少。一方面,我国战略科技人才储备结构性失衡亟待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和培养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健全。比如,当前我国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路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通过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和培养“首席科学家”。高端研发平台作用发挥不足,欠缺能够集聚顶尖人才、开展高水平项目研发和

高协同技术攻关、起到世界引领带动作用的大平台。此外,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尚待优化,战略科学家的主体地位有待提高。再比如,科学家在25~45岁时最富有创造力。对43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统计发现,获奖成果产生时年龄在45岁及以下者占总人数的81%。当前,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中,依然存在着疲于跑项目争经费、急于出成果评职称等问题,青年科技人才在绩效考

核、非升即走、学术资源竞争、薪酬待遇等方面均有较大压力。此外,教育在战略科学家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亟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急需在高等教育中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存在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发挥不充分、科技人才培养与科技产业发展紧密性不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不畅等问题。

## 人才生态环境仍需完善

战略科学家的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在这方面,我们同样有一些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比如,近年来,“破五唯”成为科教领域

关注的焦点,但“破五唯”尚未和“立新标”有机衔接。在评价活动中,“五唯”问题也没有根除,“人才帽子”较多且与物质利益、资源分配过度挂钩的现象仍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使得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时处于急功近利的人才生态中。再比如,科研诚信建设、科学家精神培养和营创新文化营造的政策措施仍需进一步落实。当下,我国科研失信长效防范机制仍有待完善,科研失信惩戒

机制缺乏应有力度,管理约束手段仍较为有限,科研不端和学术行政化问题依然存在,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现象亟待实现根本性扭转。此外,作为战略科学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建言献策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世界主要国家大多设有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沟通机制。比如,美国设有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英国设立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日本设立综合科技·创新会议。2019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但系统、灵活、高效的常态化决策咨询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 “破五唯”要结合“立新标”

建立一支战略科学家队伍的一个前提,